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主编 叶嘉莹
编著 顾之京 姚守梅 耿小博

柳永词

新释辑评

独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离愁

黯黯生天际

草色山光残照里

无人会得凭栏意

也拟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

强饮还无味

衣带渐宽都不悔

况伊消得人憔悴

中国书店

词家词

新释辑评

王士禛 朱彝尊 李煜 苏轼 辛弃疾 姜夔 史邦卿 周邦彦 李清照 吴文英 张炎 蒋捷 王沂孙 张翥 元好问 萨都剌 刘辰翁 王恽 元好问 萨都剌 刘辰翁 王恽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柳永词

新释辑评

■ 顾之京 姚守梅 耿小博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
书局

责任编辑：陶 玮 于铁红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柳永词新释辑评

顾之京 姚守梅 耿小博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13 千字

印张：21.125

印数：0 001—3 000

书号：ISBN - 80663 - 298 - 0/I·178

定价：39.00 元

敬告读者

本丛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罄者可由本社邮购。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芴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遒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陞”。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编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喻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柳永（约 984～1053 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仕途坎坷，乃专力于词作。其词多写男女恋情，以慢词为主，尤长于描写文人怀才不遇和羁旅行役之感。其词擅长白描，工于铺叙，能变旧声为新声。叶梦得谓：“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传声一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卷三）有《乐章集》传世。

从宋词发展的历程来看，柳永的词具备五个特质。

首先，柳永词既有诗化倾向，又为“曲家导源”。

柳永出身于一个仕宦之家。自幼便养成了“学而优则仕”的用世之志。但他浪漫而放诞不羁的个性却与封建正统的道德标准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宋仁宗说他：“此人任从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岂可令仕宦！”（祝穆《方輿胜览》）于是他屡遭黜落，五十岁方进士及第。为官后，自幼形成的儒家用世的思想使他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的《煮海歌》以深沉的笔触描写了盐民的痛苦生活，与历代任何关心民瘼的现实主义篇章相比都毫不逊色，《大德昌国州图志》将他列为“名宦”。不过，久沉下僚，奔波转徙的仕宦生涯并不能真正实现其“壮节”（《凤归云》）、“高志”（《如鱼水》），所以他心中仍充满着失意的悲哀。这样，便形成了其词作的情感主线之一：积极用世的志意及失意的悲慨，乃至对仕途的厌倦。

早年的柳永充满信心地对功名孜孜以求：“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征部乐》），“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科考失败后，他狂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遭黜落后，柳永以一种更为放浪形骸的方式来反抗，打着“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旗号，“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语），写下了大量的歌妓情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柳永写作妓情词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仕途的失意。）同时，他也开始了“携书剑，迢迢匹马东去”（《定风波》）的长期的漫游生活。虽然他诸尽羁旅行役的苦辛，内心一片茫然：“叹断梗难停，暮云渐杳。但黯黯魂消，寸肠凭谁表，凭驱驱，何时是了？”（《轮台子》）但从未放弃过对功名的追求。进士及第后，他一直职位卑微，辗转漂泊。如果说早期他轻视功名，在于功名的不可遽得，那么他为官后对仕途的厌倦，则实在是“尔来谪尽宦游滋味”（《定风波》）后的幡然醒悟：“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尾犯》）“屈指劳生百岁期，荣瘁相随。利牵名惹逡巡过，奈两轮、玉走如飞，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这样，他不免有“散发披襟，会须归去老渔樵”（《过涧歇近》）的归隐心理。可他最终也没有归隐，六十岁左右还在为磨勘改官事四处奔波。

可见，自柳永的词中，的确可寻绎出一条抒其用世志意及失意悲慨的情感主线。比照唐五代词及北宋前期的词，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是柳永的开创，自他开始，词的抒情走向个性化，词变得可以直接抒一己之志意，这实际是一种诗化的倾向。

柳永词在向主体的内心世界掘进，抒情言“志”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外部的大千世界，表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详见后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冲出了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藩篱，使一向由诗来表现的题材、内容进入了词的“势力范围”。

柳词的诗化倾向还表现为他的一些词句“不减唐人高处”（《侯鯖录》），“自有唐人妙境”（彭孙通《金粟词话》）。所谓“唐人高处”、“唐人妙境”指的是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极富于‘兴象’的感发”的特质，即通过“景物形象之开阔博大”、“声音气势之雄浑矫健”传达出一种“强大”的感发力量（《灵谿词说·论柳永词》）。而柳永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类的词句，所写景物意境高远，气象恢弘，音节清刚顿挫，“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人间词话》），与盛唐诗以“兴象”取胜的特质极为相近。

值得注意的是，柳永有唐人“高处”、“妙境”的词中描写的多为秋景，通过寒士悲秋感士之不遇，与“悲秋之祖”宋玉之借“悲哉，秋之为气也”，叹“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羁旅而无友生”、“蹇淹留而无成”（《九辩》），正“心有戚戚焉”。柳词中称引最多的，的确也是宋玉，如“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雪梅香》），“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玉蝴蝶》）。柳永悲秋词之融情入景的表现方式与情感内质与宋玉《九辩》的趋同性，正体现了这部分词的诗化倾向。

柳永也极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如他的“目极千里，闲倚危樯迥眺。动几许、伤春怀抱”（《古倾杯》）来自《招魂》之“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满朝欢》）来自唐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都城南庄》）。而“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迤渐迷鸳瓦。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望远行》），更是整个化用唐郑谷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雪中偶题》）

柳永虽还未能像苏轼那样自觉地“以诗为词”，其词在诗化的道路上也绝不及苏轼词走得远，但在客观上，他成了为词向诗的领域开疆拓土的第一人，成了北宋以“诗化”来革新传统文人词

的第一人。

柳永词除了具有一定的诗化倾向，更为“曲家导源”。所谓“柳词与曲，相去不能以寸”（钱斐仲《雨华庵词话》），“柳耆卿词隐约曲意，实为曲家导源”（张德瀛《词徵》）。

就创作道路而言，柳永走的是与乐工歌妓合作的创作道路，一方面是“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另一方面是耆卿“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言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而在曲最盛的元代，广大知识分子的仕进之路被堵塞，许多文人士子混迹于勾栏瓦肆，又沿着柳永的足迹，“倡优而不辞”，甚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臧晋叔《元曲选序》）。遂极大地推动了元曲的发展、繁荣。

曲在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学、平民文学，更多的是展示市井平民（如勾栏艺人、歌妓舞女、落魄书生等）的生活与心态，渗透着浓厚的市民意识。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柳永第一个将较浓厚的市民意识带入文学作品中。

柳永在词史上率先吸收大量民间俚俗语言入词，与曲之以“俗”为本色当行，雅俗共赏的语言特色正复有相似之处。

且看下列这三组作品：

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驱驱行役，萋萋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

——柳永《风归云》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那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陈草庵《山坡羊·叹世》

美人才子，合是相知。

——柳永《玉蝴蝶》

自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

——董解元《南吕宫·瑶台月》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哄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

——柳永《传花枝》

[梁州第七]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掷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

[尾] ……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自以上这几组作品的对比中，不难看出柳词与后世的曲在思想内涵、叙述口吻、语言特色诸方面的相似处。只是曲较柳词更通俗、直率，更淋漓尽致。故而况周颐说：“董（解元）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蕙风词话》）李渔则更直呼柳永为“曲祖”：“柳七词多，堪称曲祖，精魂不肯葬蒿莱。”（《笠翁余集》）

在文学史上，宋以前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元以后则是作为非正统文学的戏曲、小说占据着文坛的主导。我们以为这样一来，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无形中被历史地赋

予了这样一个使命：它必须成为由正统文学到非正统文学的转关，上承诗，下启曲。柳永作为革新传统文人词的第一人，他的词既受诗之韵意妙传，更开曲之先声，实在是于无意中契合了文学史的发展，并握住了中国文学由正统向非正统转化的机枢。

第二，柳永词既继承了唐五代文人词的传统，又继承了唐宋民间词的传统。

《花间集》是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集，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陆游《花间集跋》），宋代任何一位词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它的影响，柳永也莫能外。一部《乐章集》中，不时闪出花间词的影子：

两两黄鹂色似金，袅枝啼露动芳音。

——温庭筠《杨柳枝》

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

——柳永《黄莺儿》

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

——韦庄《思帝乡》

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

——柳永《集贤宾》

回首隔江烟火，渡头三两人家。

——张泌《河渚神》

遥认南朝路，晚烟收，三两人家古渡头。

——柳永《瑞鹧鸪》

如果说这还只是表面现象的话，那柳永的“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甘草子》），“美人纤手摘芳枝，插在钗头和凤颠”（《木兰花·海棠》），便都称得上是“花间之丽句”（《金粟词话》），颇得花间词艳婉之神韵了。

艳丽婉约是花间词的主导风格，但柳永只是偶尔学之，他的歌妓情词在总体上已摒弃了花间词剪红刻翠、对女子服饰体态、居处环境的堆砌描写，专学自然真率的一面，以通俗明快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抒情，略无隐蔽：“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定风波》）王世贞《花草蒙拾》云：“顾太尉（夔）‘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自是透骨情语……然已为柳七一派滥觞。”我们读柳永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等，则确觉王氏之言不虚妄也。此外，柳永那些直抒胸臆的词作，如《传花枝》（平生自负）、《鹤冲天》（黄金榜上）、《看花回》（屈指劳生百岁期）等更具有自然、真率、通俗的特点。

《花间集》以写艳情为主，但也有少数其他内容题材的作品，这其中便有许多为柳永所继承。如牛峤《梦江南》二首为咏物词，柳永亦有《木兰花》三首分咏杏花、海棠、柳枝；薛昭蕴有《浣溪沙》（倾国倾城恨有余）咏吴王夫差事，柳永亦有《双声子》（晚天萧索）咏之；李珣《南乡子》（乘彩舫）写江南游女采莲，柳永《河传》（淮岸向晚）亦宛若一首优美的采莲曲；韦庄有《喜迁莺》二首咏登科事，柳永亦有《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写其及第情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花间集》中的羁旅行役词，如下面这首李珣的《河传》：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猿声到客船。愁肠岂异丁香结？因别离。故国音书绝。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

前人评这首词“一气舒卷，若断婢连，有水流花放之乐，结得温厚”（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引陈廷焯语），其景物特征、结构布局、情感内涵、叙写口吻都为后来柳永的羁旅行役词所继承。

相对于“花间派”来说，南唐二主、冯延巳等因其社会地位、个人气质、审美趣味等与柳永大相径庭，所以对他的影响要小得多。但也并不是说毫无影响。例如柳永词就是沿着后主李煜词的抒情取向，走上了抒情的个性化。

柳永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向文人词学习的同时，也从根本上继承了唐宋民间词的传统。这表现为：

其一，柳永词之叙事、写景、抒情都有民间词的特色。

唐宋民间词具有民间说唱文学特色，因而还保留着较浓厚的叙事成分。如敦煌曲子词中的《倾杯乐》“忆昔笄年”（见《全唐五代词》，849页），宛如一篇女主人公的自叙传。这一特色仍保留于宋代的民间词中，如《沁园春》“小阁深沉”（见《全宋词》，3016页）。

柳永词善于叙事，前人于之多有称赏，如“叙事闲暇，有首有尾”（《碧鸡漫志》）；“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艺概》）。

柳永许多词有较强的叙事性，如《迷仙引》（才过笄年）、《锦堂春》（坠髻慵梳）、《定风波》（自春来）等。有时柳永词于叙事中还带着很强的故事情节，如上述的《锦堂春》（坠髻慵梳）简直可以演绎成话本小说，而且于叙事中刻画出女主人公大胆泼辣的性格。有时，柳永词能通过叙事传达出一种特定的情感，如《婆罗门令》（昨宵里）中对醉酒、和衣而睡、酒醒无眠的过程的铺